

瓦·哥穆尔卡

〔波兰〕扬·普塔辛斯基



33.15253

505

525

瓦·哥穆尔卡

〔波兰〕扬·普塔辛斯基

苏瑛 肖波 译

汤兰 校



新华出版社

032010

Pierwszy z trzech zwrotów
czyli rzecz o
Władysławie Gomułce
Jan Ptasieński
Krajowa Agencja Wydawnicza
Warszawa 1984

瓦·哥穆尔卡

〔波兰〕扬·普塔辛斯基 著
苏 瑛 肖 波 译
汤 兰 校

•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25印张 插页2张 145,000字
1988年8月第一版 1988年8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0182-5 /D·33 定价:2.40元
(内部发行)

译 者 的 话

本书译自波兰国家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首次转折中的哥穆尔卡》一书。本书比较详细地介绍了1948年波兰工人党内发生的一次重大事件，即反对以哥穆尔卡为代表的“右倾民族主义倾向”的事件。作者引用大量历史资料和本人与哥穆尔卡的多次谈话记录，阐明了所谓的“右倾民族主义倾向”的真相，论述了波兰党内的这次斗争与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关系。本书，对于了解波兰工人运动和党内斗争历史，对于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出身于波兰工人家庭，1926年加入波兰共产党。1938年波兰共产党解散后，他参加创建波兰工人党，并成了该党的主要活动家之一。1943年11月至1948年9月，他担任波兰工人党中央总书记。由于他在1947年反对成立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1948年又反对情报局开除南斯拉夫共产党，以及他“强调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特征和民族特点”，“主张走向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等等，他在1948年举行的波兰工人党8—9月中央全会上受到批判，并因犯有所谓的“右倾民族主义倾向”的

错误而被解除党的总书记职务。1951年他被捕入狱，1954年获释，1956年恢复名誉。1956年10月，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二届八中全会上他当选为党中央第一书记。1970年12月事件中他被迫辞职后退休。他于1982年9月1日在华沙病逝。

哥穆尔卡是波兰工人党和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杰出的活动家之一。波兰共产党人和波兰人民尊敬他，对他的功绩给予很高的评价。1985年2月6日，当哥穆尔卡诞生80周年之际，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专门会议，通过关于纪念哥穆尔卡的决议。决议称“哥穆尔卡是波兰工人运动杰出的活动家”，认为，“他在波兰工人运动以及在人民波兰的诞生和发展中发挥了卓越的作用”。为了继承波党的优良传统，教育波兰的年轻一代，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决定出版多卷本的《哥穆尔卡文集》。同日，波兰全国各地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哥穆尔卡的故乡克罗斯诺各界人民还把他的故居改建成哥穆尔卡博物馆。

本书作者扬·普塔辛斯基是波兰统一工人党老党员。他曾任波兰统一工人党热舒夫、罗兹、格但斯克等省省委第一书记。1954—1964年他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候补委员，1964—1968年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他还担任过波兰公安部副部长和波兰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他与哥穆尔卡的工作接触和私人交往颇多，因而对哥穆尔卡本人比较了解。他于1983年退休。

本书适合我国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人员和大学社会科学系的师生阅读。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译文中不免有疏误和不妥之处。我们恳切地希望读者提出批评和指正。

我对哥穆尔卡的态度——代序

在希特勒占领时期，我一直没有同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见面与谈话的机会，也无此荣幸。从1943年9月起我在华沙经常参加同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代表们的会见活动，然而，这位波兰工人党总书记在此期间埋头于党的活动战略和策略问题，还出于保密考虑，他不得不把自己的接触限制在最亲密的合作者的范围内。迫使他这样做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前任的不幸遭遇：马尔采利·诺沃特科^①在担任党的领导职务11个月后惨遭暗杀，而帕维尔·费德尔^②也在担任波兰工人党总书记11个月后被捕入狱。

当时为了对付希特勒占领者及其走狗——国内政治反对派，党必须处于绝对秘密状态。关于党的领导情况，我只是在华沙从伊格纳采·洛加一索文斯基^③那里了解到一鳞半爪，那是一位具有丰富的革命经验、异常勤奋、富有自我牺牲精神和英勇果断的人，他化名为维斯瓦夫。伊格纳采在“向我们吹风”时，热烈而诚挚地谈论他，看得出伊格纳采是十分尊敬他的。

1944年6月，当我同中央派来帮助我们工作的雅德维加·卢德文斯卡^④一起去北玛佐夫舍时，她对我谈到了维斯瓦夫。她是

1942年在喀尔巴阡山地区认识维斯瓦夫的，当时他们一道组织了波兰工人党。她的谈话使我了解到，维斯瓦夫是一位具有渊博知识、年富力强、精力充沛、深谋远虑的共产主义活动家。

1944年秋天，当我们同我国当时的首都卢布林建立了无线电联系后，从密码电报中获悉，维斯瓦夫已经在波兰的解放区，并在那里领导被占领地区党的活动。后来，一些发到我们那里——波兰工人党区委员会的密码电报上常有他的署名。当我得知维斯瓦夫平安无恙，并且在解放了的卢布林领导党的活动的消息时，我很难形容当时的高兴情绪。当时我尚未见过维斯瓦夫，也未听过他的讲话，但我却非常思念他。占领时期，严峻的斗争岁月把所有的人，不论其职位和级别的高低，都结成了亲密的战友关系。

我是在1945年5月27——28日举行的波兰工人党积极分子会议上第一次见到维斯瓦夫的，当时我担任波兰工人党普沃斯克县委员会第一书记。不过，解放后我已见到过他的照片。维斯瓦夫主持了这次会议，他在会上讲了关于战后重建国家、经营管理当时称之为收复地区的西部和北部领土，以及巩固尚处在反动派武装骚乱威胁之下的人民政权等问题。他的讲话热情洋溢，逻辑严谨，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当时他40岁。这个时期是哥穆尔卡发表演说最多的时期，当然，我不仅仅指1945年。他经常在党的集会上、工会会议上、国家行政和经济代表会议上、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和讲话，为报刊撰写文章，并回答记者的提问。他的演说和讲话，特别是在揭露米科瓦伊奇克^⑤的破坏作用以后的演说和讲话，不仅为我们指出了活动的明确路线，而且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和斗志。

那时的指示还没有后来所具有的那种意义。当波兰工人党的

干部都单独地进行活动时，他们遵循的正是自己领袖在讲话中提到的一般性政治指示。那时，维斯瓦夫不愧为人民的喉舌，他的讲话令人信服，扣人心弦，鼓舞全党的斗志。这既不是空话，也不是大话，而是事实。当时，在地方上深深地“扎下根”的许多活动家，直到今天还常常回忆起那时的情景。那时，党员数量并不多，只有20多万名，却是团结的、步调一致的，他们团结在维斯瓦夫的周围。那时对我们来说，维斯瓦夫就是党，尽管后来经过几番挫折和失望，这样说也许难以令人置信。

1945年12月在华沙罗梅会议厅召开的波兰工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是波兰共产党人活动中的重大事件。这是自从1918年12月举行的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同波兰社会党左翼的联合代表大会以来，波兰革命运动代表的第一次合法性代表大会。所有波兰革命者，包括革命初期的活动家和领导波兰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的活动家，均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相逢了。

在代表大会上，维斯瓦夫的报告鼓舞了我和所有与会代表。他在报告中描绘了建设新波兰——社会主义的国家、波兰儿女们的祖国的美好前景。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整个会议大厅同党的领袖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总书记的讲话铿锵有力，热情洋溢，充满着激情、信心和力量。

今天，当我回忆起当时情景时，我又仿佛看到维斯瓦夫在讲台上谴责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号召建立统一战线和工农联盟，号召按照我们自己的计划，齐心协力地建设我们家园的激动人心的场面。维斯瓦夫在报告结束时向与会代表发出了号召。他说：

“请你们到整个工人阶级中去。请告诉他们，波兰工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为他们和为波兰指明了道路。”对这一号召的反响，往往再现于对这次历史性代表大会的反应之中。我还记得，我在战

前的一位政治教师弗朗齐谢克·温奇茨基(6)，他那时已是波兰工人运动的老革命家了，在会议大厅外的走廊上，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这就是我们盼望已久的领袖，他的讲话充满智慧、果敢精神和逻辑性。”我非常同意“弗朗克叔叔”——从小我就这样称呼他——的看法。哥穆尔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完全征服了我。

1946年1月，我开始在波兰工人党华沙省委员会工作，任省委某部门的负责人。这一年是非常艰苦的一年。阶级斗争使社会情绪激化。米科瓦伊奇克在拼凑了一个旨在反对人民政权的农民党反对派后，开始发难。地下武装势力支持了他。联合起来的反革命势力把主要矛头指向波兰工人党，妄图阻挠建立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和工农联盟。我见到哥穆尔卡的机会越来越多了。因为他常常在首都群众集会、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和两个工人阶级政党的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他的话语严肃而坚决，就象那些岁月的现实状况一样。他既不掩饰政治上成堆的困难，也不掩饰我们的缺点。他揭穿了米科瓦伊奇克的阴谋及其同地下武装势力的勾结，抨击了波兰反动派在国外的庇护者所搞的反波活动。与此同时，他以这一斗争所需要的理论武装了党，动员全党去进行艰巨的战斗。他号召所有善良的人们保持理智，重建遭受破坏的国家和社会安宁。

维斯瓦夫当时的演说成了人们学习的楷模。他善于阐述人民的历史，并努力从人民的不幸中总结实际的教训。另外，哥穆尔卡具有敏锐的思维能力，善于抓住最重要的问题，善于掌握人心。我们曾以赞同的心情，聚精会神地聆听了他的讲话，然后大家不约而同地、发自内心地、有节奏地高呼他的名字：“维—斯瓦夫”、“维—斯瓦夫”。这种感情是无法佯装的。我们说，当时

没有任何制造个人迷信的企图，而是党对自己领袖的尊敬和信赖，全党与以维斯瓦夫为代表的党的领导团结一致的表现。这些话对今天的青年来说是不会相信的，因为他们没有亲身体验过这种浪漫主义和求实精神融为一体的感情。

1947年秋天，我被党中央派到热舒夫省，担任波兰工人党热舒夫省委第二书记。这样，我见到哥穆尔卡和听他讲话的机会就少了，但是我却熟悉了他的出生地。我遇到许多同维斯瓦夫一块长大并一道参加活动的人，了解到他成长的环境。对喀尔巴阡山区实际情况，特别是对1918——1939年该地区实际情况的了解，使我受益匪浅。这对于我在以后的章节中描述哥穆尔卡的个性是很有用处的。

当我在波兰工人党中央党校学习时，党内出现了一次转折，这次转折当时称之为“右倾民族主义倾向”。这对于我个人和我们这一代波兰共产党人来说，是第一次巨大的政治震动。党的领袖在领导全党取得了最伟大的成就以后，却遭到了排斥和谴责，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今天我们更加不能接受当时关于“推倒偶像”的说法，而当时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更是不能同意的事情。这是因为不应忘记，哥穆尔卡领导我党和劳动人民胜利地接管了国家政权，解决了“谁战胜谁”的问题，即打退了纠集在一起的反革命势力妄图从工人阶级手中夺取国家政权的反扑。这一切虽已成为往事，但我们仍记忆犹新。

我们的学校位于“玫瑰”林荫大道原党中央大厦内。波兰工人党中央全体会议是在大厦五层的一间大厅里举行的。我们大家都以不安的心情注视着那里发生的事情。然而，从8—9月中央全体会议上透露出来的消息很少，党内强调必须严守党的秘密。当时在党校学习的都是富有经验的成年人，特别是经受过生死考

验的人，尽管情况并不很清楚，（因为当时没有开过任何吹风会）但整个学校议论纷纷，犹如被捅了的马蜂窝。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方式感受着正在发生的一切，有的沉默，有的则同最亲密的战友私下议论心中的疑虑。学校沉浸在忧伤情绪之中。我们都如饥似渴地读报，想从发表的材料中寻求答案。

传达右倾民族主义倾向问题的党中央机关干部会议终于在原公安部的俱乐部大厅里召开了。它给人留下了极不愉快的印象，正因为如此，至今还记得一清二楚。以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新的总书记博莱斯瓦夫·贝鲁特（7）为首的政治局全体成员都出席了会议，已被解除总书记职务，但仍保留在政治局内的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也出席了会议。我和大家都关注着他。他成为这场悲剧的主角。他有些沮丧、沉默、心情压抑，面露倦意。会议的基调对他极为不利——不信任他。尽管如此，大家还是希望哥穆尔卡发言，我也迫不及待地期望维斯瓦夫说点什么。我现在还记得铭刻在我记忆中的坚定而诚挚的话语：“请你们转告大家，维斯瓦夫尽管犯了错误，但他将永远同党在一起。”但是，“一贯正确者们”（维拉·科斯切娃（8）对那些自以为一贯正确，从不犯错误，而总是坚持“路线”的人们的一种称呼）的歇斯底里的发言使我吃惊，同时也破坏了会议大厅内的气氛，他们要求对哥穆尔卡进行严厉的制裁。我迷惑不解，于是退出了会场。

这次会议后不久，党校召开了学员和教师联席会议，传达哥穆尔卡的右倾民族主义倾向问题。会议由校长塔德乌什·达尼谢夫斯基（9）主持，他作了传达报告，随后大家围绕报告展开了讨论。绝大多数学员发了言，他们各自以审慎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一些事情的怀疑，还提出了许多有待澄清的问题。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后来，我曾有机会同达尼谢夫斯基进行一次长时间的、有礼

貌的和令人愉快的谈话。在谈话过程中，他尽量解释我提出的一些问题。我知道，其他同志也曾被校长请去谈话。

关于“右倾民族主义倾向”的一些实质性问题，后面我还会讲到。现在我想谈谈党及其活动家们为什么这样快就同意失去一位受人尊敬，功绩显赫的领导人。我毫不隐讳地说，这里我也为了寻求对自己的“宽恕”。我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维斯瓦夫本人作了自我批评。今天我们知道，这是在某种精神压力下被迫作出的，当时我们却真心诚意地接受了他的自我批评。第二、中央委员会，其中包括那些被列入哥穆尔卡追随者行列的中央委员，对他的立场进行了一致的批评。这是被歪曲了的真相，但没有这种歪曲就很难理解排除哥穆尔卡以后所发生的一切。对后者的态度必须考虑到对他们所施加的精神压力，这种压力往往是以所谓维护党内团结的名义而施加的。因此，我也很快消除了自己的所有疑问，认为“右倾民族主义倾向”就是反对党和反对波兰利益的活动。

维斯瓦夫从政治舞台上消失，并销声匿迹了，不公开露面，也不再发表讲话了。党开始筹备召开两党（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译者注）合并的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的活动是在同哥穆尔卡主义作斗争的口号下进行的。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随后在两党合并的代表大会上，波兰统一工人党团结在新的领导人博莱斯瓦夫·贝鲁特的周围。哥穆尔卡是两党合并的代表大会的代表，并坐在大会主席团席上。他中止了自己的沉默，并向代表们发表了讲话，他想证明自己是正确的，他也并不认为，他的讲话及其观点会损害党。代表们以沉默和冷漠的态度听取了他的讲话。我也不欣赏他的这个讲话，甚至认为哥穆尔卡很坏，他想利用这次代表大会来解决个人问题。我想，哥穆尔卡自己并未意识到，

经过数月的反哥穆尔卡运动，党内对他的态度已经改变了。我想，也许是因为他要表示为自己在9月份已经承认的许多“错误”承担责任。因此，大家把他的讲话看成是从过去自我批评立场上的一种倒退。当时的舆论就是这样。今天我对哥穆尔卡这一讲话的看法与当时截然不同了，因为当时我了解得太少。

哥穆尔卡问题在1949年11月举行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三中全会上又一次被列入议事日程。爱德华·奥哈布(10)在《新路》月刊上发表的长篇文章是一个信号。当时我担任波兰统一工人党热舒夫省委第一书记，事先我并不知道全会的议题。这可能是因为我那个省离首都较远，也可能因为我担任这一职务才几个月，还没有“信息渠道”。当我听了博莱斯瓦夫·贝鲁特的报告后，才意识到，“右倾民族主义倾向”问题重新提到了党的最高讲坛。这时，哥穆尔卡追随者的范围业已扩大，其中包括了不久前还谴责他的人。对他的指控十分严厉，甚至上纲到叛变的高度。贝鲁特讲话措词尖锐，会场气氛严肃。不过，这时所有的与会者，当然被指责的人除外，已不再怀疑指控的真实性。这是维斯瓦夫被捕前，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中央全会是在部长会议大厦圆柱大厅内举行的，他孤独地坐在第一张桌子的最右边。大家都回避他，大家都攻击他，我也不例外。

哥穆尔卡出色地为自己进行辩护，驳斥对方的指控，澄清事实并进行反击。他讲话激动，语调坚定而果断。此时此刻，他同我一年前在公安部俱乐部会议厅见到的那个沮丧而筋疲力尽的哥穆尔卡判若两人。这时他又是1945—1947年期间的哥穆尔卡了，一位讲话流利、能说善辩、果断而坚定的人民喉舌。25年后，他在一次谈话中告诉我，当时他已经意识到所面临的危险，意识到他面临一场为保卫自己的脑袋和生命的斗争。

对哥穆尔卡进行了为时两天的大规模攻击，言词尖刻，不择手段。我虽然不大赞同会场上的气氛，但我却自愿要求发言，这是我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第一次发言，遗憾的是，这是一次反对哥穆尔卡的发言。我的发言真实地反映了我自己当时的观点，初期的动摇已成过去，甚至没有留下痕迹。事隔多年，每当我回首往事时，我不止一次地追思这篇发言的内容。这是我在几十年政治生涯中唯一令我后悔的一次发言。事情就是如此：我们的历史是如此的艰难、复杂和令人痛心。不过，不应让历史本身去承担责任，我必须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从这个令人不快的讲话中吸取教训。后来，我再也未参与过任何集体性的狂热活动，甚至当人们期待我时，也未做过。

令人奇怪的是，哥穆尔卡的名字就这么容易地从日常生活中消逝了。时光迅速地使人们忘却那些颇有建树，并为本阶级和人民的幸福贡献了自己力量和才干的人。哥穆尔卡的名字在报刊版面中消失了，也在教科书和其他书籍中泯灭了，即使偶然出现，也是作为反面人物而出现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一届三中全会上，哥穆尔卡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他的职务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从最高监察院副院长降为社会保险公司经理。

1951年8月2日，哥穆尔卡被捕。然而，公众直到10月才知道这个消息，因为这时议会宣布剥夺他的议员资格。随后，在沉默了大约一年半以后，党中央书记瓦迪斯瓦夫·德沃拉科夫斯基(11)在讲话中向哥穆尔卡提出了出乎意料的严厉谴责。他宣布，不久可能要开庭审讯哥穆尔卡。这在党的积极分子中间并没有引起太大震动，也许是因为当时一些人民民主国家都先后逮捕和审讯了被开除出党的共产党人，尽管除波兰外，没有一个国家对党的领袖提出指控。

1952年12月，我被任命为公安部副部长。我出于好奇开始向我的新同事们打听哥穆尔卡案件。主管这一案件的罗姆科夫斯基(12)将军对我守口如瓶，噤若寒蝉。我从拉德凯维奇(13)部长谈话中得到的印象是，他不愿意过多地了解这个案件。公安部领导层对这一案件置若罔闻，谁都不提，也不随便议论。这是很有代表性的情况。这个案件只有十司的人才知道。有一次我曾问十司司长阿纳托尔·费伊金(14)上校，他那里有没有关于哥穆尔卡案件的情况。他无奈地摊开双手，回答说：“斯大林(15)都没能压服他，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如今已众所周知，当时之所以不再提及审讯哥穆尔卡问题，首先是考虑到他的态度，因为他可能在法庭上成为原告，而不是被告。

哥穆尔卡不愿谈论自己生活中的这段黑暗时期。对一个遭受过打击的人来说，每次打击都是痛苦的，而特别令人痛心的是，这些打击并非出自敌人之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波兰，哥穆尔卡不止一次地蹲过监狱。这遭遇对他来说是正常的，完全可以理解，因为这是他选定的生活道路的必然结果。令人痛心的是，在人民波兰由于同事之间的问题而把他投入监狱。有一次，在为数不多的人一块庆祝他70寿辰之际，情绪极佳的维斯瓦夫开始梦幻般地谈起自己坎坷而复杂的生涯。他伤心地回忆起自己被孤独的软禁在华沙郊外别墅中的悲剧。但是，总的说来，他不愿意重提这些问题。每当我提及时，他马上把话题引开。这情况在我同他谈话时曾出现过不止一次。显然，对这段黑暗时期的回忆总会刺痛他的心。

第一个对反哥穆尔卡的正确性公开表示怀疑的人是维克托尔·克沃谢维奇(16)。他是在1954年11月29日举行的党干部讨论法制问题的大会上提出自己看法的。然而，深入讨论时没有人触及这

个问题，相反，有些人却大谈什么哥穆尔卡分子在党内制造混乱。雅库布·贝尔曼(17)、爱德华·奥哈布、希拉雷·明兹(18)都就斯塔尼斯瓦夫·拉德凯维奇的报告发了言，但是，政治局委员中没有人涉及上述提出的问题。博莱斯瓦夫·贝鲁特只是第二天深夜致闭幕词时，才提到克沃谢维奇的意见。不过，我认为，正是这次会议导致了释放哥穆尔卡。向维斯瓦夫宣布释放消息的任务交给了安全委员会主席瓦迪斯瓦夫·德沃拉科夫斯基（当时他是政治局委员）。德沃拉科夫斯基很不愿意承担这一任务，他想推给其他人。他提出作为公安部负责人不宜承担这一任务，因而竭力推托，企图摆脱这个任务。但是，贝鲁特亲自委托了他，他只得去向维斯瓦夫宣布：你自由了。随后，哥穆尔卡住进了公安部医院，当然是处于监视之下，医院位于当时的伏沃夫斯基街（现在的科马罗夫街）。德沃拉科夫斯基回到自己办公室时，已经是夜晚了。我们大家都在等着他。他的情绪很不好，不大愿意讲话。很明显，他经历了不平常的时刻。他跟我们谈的情况不多。他向哥穆尔卡作了自我介绍，说他作为安全委员会主席向哥穆尔卡宣读释放决定，哥穆尔卡非常冷静，只提了一个问题：“你们能肯定以后不再逮捕共产党人吗？”

那时，我并没有想到，哥穆尔卡会重新执政。我曾经认为，歪曲了他的形象的指控将使他不可能再从事政治活动了。当时，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逮捕哥穆尔卡，并指责他变节和从事旨在危害波兰的活动，都是错误的，但是1948年下半年对他提出的政治性指控仍会全部保留不变。

至于对马里安·斯彼哈尔斯基(19)，仍准备开庭审讯。负责这项工作的安全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安托尼·阿尔斯泰尔(20)经常携带起诉书的新文本去中央委员会大厦二楼。一直到苏联共产党第

二十次代表大会开过后，才决定释放马里安·斯彼哈尔斯基，但仍然保留了对他的政治性指控。

1956年4月6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爱德华·奥哈布在华沙和华沙省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发表第一次讲话时，还给哥穆尔卡“制造麻烦”。他强调说，哥穆尔卡集团从思想上被粉碎了，而波兰统一工人党正是在同哥穆尔卡集团的斗争中壮大起来的。他坚持过去对哥穆尔卡提出的所有政治性指控是准确的。可以这样认为，直到今天，爱德华·奥哈布对哥穆尔卡的看法仍然没有改变。

我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属于那种不会朝夕改变自己观点的人。对于我来说，1948年谴责哥穆尔卡是困难的，而更为困难的是今天要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我毫不隐讳地说，1956年秋天，我还未从对哥穆尔卡政治态度的指责中解脱出来，当时我仍相信对他的指控。所以，我是怀着复杂的心情参加1956年10月召开的第八次党中央全体会议的。

一段时间以来，在党的活动家中间流传着领导班子将发生重大变动的消息。9月底，当我休假回来后，安全委员会秘书兹比格涅夫·帕什科夫斯基上校拉我一同散步，并告诉我：正在私下进行着某种“奇怪的活动”，安托尼·阿尔斯泰尔也参与了这种活动。这就是那些在七中全会上还坚决反对哥穆尔卡的人，现在争先恐后地登门拜访他，显然是想得到他的宽恕。

这里有必要回溯一下1956年7月举行的七中全会对哥穆尔卡其人的讨论情况。爱德华·奥哈布在会上作报告时说：曾同哥穆尔卡进行过两次谈话，在谈话过程中，哥穆尔卡收回了过去作的自我批评，认为自己的立场是正确的。与此同时，奥哈布还声称，将继续同哥穆尔卡进行谈话，以促使他站到符合党的路线的